



在台北盆地那幾條縱橫交錯的捷運線末端，或是跨過淡水河、基隆河的橋樑之後，蘆洲、深坑與八里呈現出一種與信義區截然不同的生命節奏，當捷運共構與鋼骨辦公大樓不斷重新定義天際線時，這些近郊城鎮的街廓裡，卻隱藏著無數「繁華的皺摺」，在巷弄狹窄到連救護車都難以迴轉，老舊公寓的磁磚剝落，樓梯間總是瀰漫著一種混合了潮濕與霉味的陳舊氣息，這正是許多獨居長者最後的堡壘。

大眾的目光往往聚焦於宏大的社會住宅政策或高科技的長照技術，但有一群人，正生活在這些數據無法完全覆蓋的陰影之中，他們並非全然一無所有，卻在「擁有產權」與「缺乏現金」的夾縫中，被迫成為社會安全網最邊緣的游魂，社團法人新北市共好慈善協會蘆洲站的站長佩欣，與她的志工夥伴們，每日就在沒有電梯、階梯寬度僅容一人的狹小空間裡穿梭，那一份熱騰騰的晚餐不只是溫飽，更是一次「生命跡象的確認」，他們正試圖用最原始的人情味，去縫補一張在現代官僚體制下逐漸失靈的防護網。

## 制度外的叛逆者：為什麼我們選擇「共好」

社團法人新北市共好慈善協會成立於 2021 年，這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組織，但成員卻是一群在社福界打滾多年的「老兵」，佩欣回憶起當初選擇離開大型社福機構的原因，語氣中帶著一種對體制的無奈與不屈，在大型機構裡，一切運作邏輯往往圍繞著數字與績效指標打轉，那些擁有充沛資源與政府補助的單位，雖然規模宏大，卻也往往伴隨著繁雜的規矩與僵化的行政流程。

當一個長者的真實需求只是「家裡的燈泡壞了」或是「馬桶漏水」，在體制的邏輯裡，這往往不屬於標準化的「長照服務」範疇，也沒有相對應的經費編號可以報銷，社工們被埋在寫不完的報表與數字目標中，卻無法處理長者雜而細碎的生活瑣事，這種制度性的失能讓佩欣感到揪心，更殘酷的是，許多真正需要幫助的人，往往因為一點點關於產權或戶籍的微小門檻，就被擋在政府補助的門外，這些被排除在灰色地帶的人，成了社福體系中最沈默的一群。

為了接住這些游走在邊緣的靈魂，共好慈善協會的夥伴們決定走出體制，尋求一種更能貼近「人」的運作模式，由於理事長是深坑人，協會最初從深坑起家，隨後擴散到蘆洲與八里，服務項目

幾乎可以用「包山包海」來形容，從每日風雨無阻的午晚餐送餐訪視，到陪同長輩去醫學中心就醫，甚至是協助居家環境的修繕，在協會的字典裡，沒有什麼事是「太小而不值得做」，因為在長輩眼裡，尊嚴往往就藏在那些被外界忽略的細節之中。

## 你有力氣，我有腳：一場關於平等的對話

協會最核心理念非常樸實：「你有力氣，我有腳；你能看，我能走。」這句話背後隱含的是一種深層的尊重與對等，站長說，協會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資源給予者，更像是一個「連接者」，將社會的善意與長輩的需求相互對接。在都會區推行服務，最大的挑戰往往不是體力上的消耗，而是那種經年累月築起的「都會型冷漠」，在蘆洲這種老舊社區，長輩對陌生人的敲門聲是非常敏感且防備的，想要打破這道心牆，不能靠標準化的行政程序，只能靠無盡的接納與耐性。如果長輩今天心情不好、不想要志工進門，大家就在門口站著聊幾句；如果長輩覺得今天家裡還有剩菜、不需要這份晚餐，志工就微笑著說那這份就留給更需要的人。

這種互動不再是冰冷的物資發放，而是鄰里間的人情流動，親切的一句「食飽未」，往往比任何官方的慰問信都更能觸動長輩的心弦，比起冷冰冰的送餐數據，這種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對話，才是長輩在孤獨晚年中最渴求的心理慰藉。

## 制度外的灰色地帶：被資產定義的「邊緣貧窮」

在台灣現行的社會福利體系中，資源的分配往往極度依賴嚴格的資產審查，這種以「戶籍」與「資產」為核心的審查邏輯，在實務現場卻造成了嚴重的邊緣化現象，佩欣指出，這正是目前蘆洲

、深坑等地長輩面臨的最大困境，很多人先入為主地以為，長輩只要住在自己名下的房子裡就不算窮，但現實情況卻遠比數字複雜得多。

許多長輩守著那棟幾十年前在經濟起飛期拼下的老舊公寓，身上卻連看病的一百塊掛號費都掏不出來，因為擁有名義上的產權，他們的資產總值往往會輕易超過申請政府低收補助的門檻，然而那棟房子對他們而言，僅僅是一個遮風避雨的殼，在沒有現金流入的情況下，房產無法變現，甚至因為屋況破舊、需要頻繁維修，反而成了沈重的生活負擔。

這些被稱為「有產權、無現金」的個案，在法規的界線下成了邊緣人，在區公所與里長的轉介清單裡，他們不符合低收入戶資格，卻連更換一個壞掉的熱水器，都沒有多餘的現金可以支應。共好慈善協會看見了這個缺口，因此他們不僅提供物質上的支持，更致力於心理上的重建，站長觀察到，長輩的自我價值感會隨著身體機能一同退化，當他們覺得自己沒用了、被社會遺棄了，身體機能往往會垮得更快，為了讓長輩有「依附點」，協會每月舉辦的慶生會與義剪活動，本質上就是給他們一個再次踏出家門、重新感受生活盼望的理由。

### 醫療的長征：一段三十分鐘卻要走一整天的路

如果貧窮是隱性的折磨，那麼醫療的不便利就是這群長者最直接、最劇烈的生理痛楚，以蘆洲地區為例，雖然街頭巷尾基層診所林立，但大多僅能處理一般的感冒發燒，極度缺乏具備急診能力與完整專科醫療量能的大型醫學中心，長者一旦患有複雜的慢性病、心血管疾病或急性症狀，往往需要跨區前往三重、五股甚至台北市的核心區域就醫。

這段在年輕人或普通人眼中，僅需三十分鐘車程的距離，對於行動不便且缺乏家屬陪同的獨居長者而言，卻是一場漫長而痛苦的征途，現行的長照交通接送復康巴士系統雖提供了較為低廉的費用，但在實務運作上長照對於照顧者而言卻存在著巨大的侷限。

首先，長照交通接送復康巴士的預約機制極其競爭，對不熟悉數位操作的長者來說幾乎是天方夜譚，為了最大化運輸效率，車輛往往採取集體載送與定點接駁的模式，對於一個需要推著輪椅、甚至意識不甚清醒的長者來說，一次看似簡單的就醫，往往從清晨五點天還沒亮就要開始準備出門等待接駁車，到了醫院後，又得在診間漫長地等待跳號，甚至得在冷氣強勁、充滿消毒水味的醫院廊道上，忍受著孤獨感吃著冷掉的便當，等到領完藥、再次預約回程車輛並順利回到家時，往往已經是傍晚，整整一天的體力消磨對長者來說，簡直是透支了數日的生命力。

最令人鼻酸的景象莫過於「老的帶更老的」，經常能看見一位八十歲、走路已經有些顫抖的配偶，正吃力地推著九十歲、坐輪椅的另一半；或者是老邁的父母，手中緊緊牽著步履蹣跚的身障子女。他們在擁擠的診間裡互相扶持，你等我上廁所、我等你拿藥，彼此都沒有獨自完成複雜就醫流程的能力，卻又無人可以代勞。這種「互為拐杖」的依賴關係，在缺乏陪診志工與整合性門診的現況下，顯得格外蒼涼與無助，站長感嘆，許多長者因為畏懼這套繁瑣且耗時的流程，加上不識字或僅能以台語溝通的障礙，往往選擇隱忍病痛，安慰自己「老了本來就會痛」，最終，原本可以控制的小病被拖成了大病，甚至錯失了最佳的治療時機，這也說明了，若缺乏便利的交通配套與社區化的就醫陪同服務，長者的健康權益將永遠被阻隔在醫院那扇厚重的大門之外。

政府近年來在長照議題上投入了大量資源，並大力推動科技輔具與 AI 緊急救援系統，試圖用智慧化手段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，然而，第一線的服務者卻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面向，在推動這些先進

設備時，政府傾向於購置高價的監控器材，卻未充分考慮到長者對隱私權與人性尊嚴的堅持。長者往往對被「監視」感到極度排斥，對他們來說，家是最後的隱私堡壘，安裝監視器會讓他們覺得自己像是在被全天候監控的囚犯，「長者真正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監視器，而是有人能每日與他們說上一句話。」佩欣強調在過度追求數據與指標的績效文化下，社工與志工有時被轉化為填寫報表的「數據工人」，服務的質量與人性化的溫度，在追求數位化的過程中逐漸流失。當系統只在乎一通電話是否打通、一個數據是否上傳，那種關懷背後的「生命交流」便蕩然無存。

### 搖搖欲墜的財務現況：民間組織的生存與尊嚴

在沉重的服務需求下，像共好慈善協會這樣的民間社福組織，生存現狀同樣令人憂心，目前協會幾乎完全依賴民間的小額捐款與定期定額贊助，每個月高達三、四十萬元的常態支出，包含服務人員人事費、服務費、租金支出、送餐餐費及長者用品支出等，使得協會長期處於負債運作的邊緣，只有在農曆年前後，當社會愛心較為集中時，募款狀況才略微好轉，但這對於全年的細水長流而言，無疑是杯水車薪。

財務上的不穩定，直接限制了服務的深度與廣度，雖然協會希望與具備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品牌性贊助，也曾經和大品牌合作過，但只停留在單一次的營養品捐贈，並沒有成為長期的合作關係，現實中的情況是，大型企業的社會責任預算往往偏向流向具備高度媒體聲量、能夠產出漂亮數據的大型組織，像共好慈善協會這樣深耕社區、服務細節瑣碎且難以量化為漂亮績效的小型單位，往往在資源競爭中被邊緣化。佩欣坦言，物力與財力的匱乏固然令人疲憊，但更令人心寒的是體制內的僵化。

## 在脆弱時刻，依然會有人按響門鈴

站長認為，社福工作不只是給予，更是尊重，這種尊重體現在不強迫長者接受他們不需要的服務，體現在願意花一整天的時間陪長者在醫院等待，也體現在將每個人視為平等的、有能力互相幫忙的個體，在蘆洲的小巷裡，協會的志工們仍每日風雨無阻地送出那四十份熱騰騰的晚餐，這不只是一份餐點，更是一個讓長者能安心入睡的承諾。

「要先做！做不到，至少努力過了；不要都不做，只靠想。」站長堅定的說。台灣的社福政策需要更多的「先做再說」，人的溫度，始終是社會安全網最堅實的材料，在數據統治的時代，我們更應珍惜那些不計成敗，願意在灰色地帶持續點燈的民間力量，真正的尊嚴，不是來自於科技的監控，而是來自於知道在脆弱的時刻，依然會有人按響門鈴的問候，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關懷，正是支撐這座城市在寒冬中仍保有一絲溫暖的起點；在數據與研討會之外，那些被擱置在診間候診椅上、疲憊地互相等待的長者們，正等待著一個更具人情味的體制，唯有當政策制定者願意放下冰冷的指標，真正走進那些沒有電梯的老舊公寓，看見長者在就醫路上的蹣跚身影，我們才有可能建立一個真正「共好」的社會。

作者 翁歆嫻 為政治工作者